



中国倡议回答世界之间时代之问

□ 陈艺元



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和方案，旨在动员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截至目前，倡议已得到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2022年初“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正式成立，来自联合国机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包括80多国常驻代表参会。可以预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平台凝聚倡议共识，大家共同参与形成强大合力，各展优势、各施所长，共同成长、共享收获，必将为落实2030年议程和全球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局势、解决安全治理问题而贡献的中国良方。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针对全球和平、安全、信任、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多的现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为构建全球安全框架开出了中国“药方”。即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秉持相互尊重的立场，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全球安全倡议”顺应国际社会人心，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共鸣。

(二)

中国倡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在体现，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支撑，以对新时代形势的判断为依据，并从我国成功的外交工作经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 and 养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丰富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在对外工作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子，体现了中国智慧，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倡议包含对国际环境与形势的最新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意愿和解决能力在提高，对国际体系的应对和塑造能力在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在提高。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不时发生，国际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

深刻调整的时期。

中国倡议坚守多边主义，致力于合作共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力图汇聚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力量，不搞结盟对抗、不搞“筑墙”“脱钩”，对任何具有合作意愿、认可倡议精神的国家，中国都积极对接，根据实际需求 and 情况灵活展开合作。倡议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采取“一国一议”“一事一议”的办法，不搞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框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

中国倡议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将“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等中华传统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中国倡议以此为基础，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认同。

中国倡议是开放性的合作倡议，坚持务实合作的大方向，而非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单一外交框架或方案。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提出的重大政策主张，是对接重点领域、不同合作机制、全球伙伴，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这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面向全球开放，既提纲挈领地指明方向，又提供具体务实的行动指南。这样的倡议所能涵盖的体量非单一条约、框架协议或外交方案所能比拟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倡议为方向，可以包容相关各方、对接不同平台，因地制宜地制订灵活的方案。

(三)

中国倡议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机制实现全覆盖，各方向合作实现全覆盖。在中非关系、中阿关系、中拉关系方面都取得全面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上新高度。中美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挑战中取得新进展。全球安全倡议则在俄乌冲突爆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

中国倡议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彰显大国担当。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鲜明的中国方案。中国逐渐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分别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为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继续扩大《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影响，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迈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意识和能力逐步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获得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支持和信任。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新加坡作为一个具有金融属性的城市国家，农业用地仅占0.9%，导致粮食自给率不到10%，90%以上的粮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对外依存度极高。从国际范围看，受世界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影响，全球食物供应链中断受阻时有发生，多样化粮食流通效率起伏不定，因此，新加坡粮食安全不稳定性更为凸显。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境地，维护本国粮食安全，新加坡政府立足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多措并举提升粮食安全韧性。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新加坡政府不仅提高了本土粮食产量、最大限度克服了受国内自然条件限制而产生的“产量约束”困境，还拓宽粮食进口来源，最大限度减轻了受世界政治经济影响而引发的国际断供或供应不足的“流量约束”压力，极大地提升了新加坡粮食安全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与新加坡政府在完善粮食贸易体系、发展现代化都市农业以及加强教育引导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密不可分。

以自由完善的粮食贸易体系为核心，拓展粮食进口来源。一方面，新加坡利用自身国际贸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实行多元化粮食进口策略，与多国签署保障供应链和贸易畅通协议，以期降低特殊时期粮食供应中断或供应不足的潜在影响。新加坡主要以进口食物制成品为主。2004年，新加坡食品进口来源国为140个，2021年，增至170多个国家。进口额最大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进口比例在16%—17%之间，来自美国、中国、法国、新西兰、印尼等其他国家的粮食进口比例较为均衡且进口份额都在新加坡有效控制范围内。此外，新加坡政府还与进口份额较大的国家签订食品进口连续性计划协定，以保障必需食品供应稳定。一方面，通过弹性进口策略，不仅确保在某一进口国供给不足或中断时，可由其他进口渠道替代，以便保持变通性和适应性，还有利于稳定国内食品价格。另一方面，新加坡利用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粮食外资企业，以期提升政府在国际粮食稳价议价能力。国内轻工业重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得农业企业发展相对受限，为此，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发展农业，不仅开拓其国际粮食市场，还利用规模经济以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条件来缓解“流量约束”的桎梏，有助于抵御特殊时期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带来的外部风险。目前新加坡的一些企业已经涉足澳大利亚、文莱、泰国和中国等。

以现代化都市农业发展战略为关键，提升本土粮食产量。受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发展高度集约型的现代化都市农业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为此，新加坡政府以发展农业科技为中心，不断调整不同时期下的农业发展规划目标和内容。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统筹现代化都市农业发展总体布局，注重农业技术人员培养、农业生产技术普及、农业科技产业链构建以及农业相关产品的初级研发；70年代突出

农业生产基地的转型升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农产品疾病预防、诊断和监测项目，着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化效应；80、90年代着力建设现代科技农业园，进行设备改造升级和强化食品检疫监督。高科技、高产值是其鲜明特色，旨在最大限度、最高程度提高单位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保障食品营养，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开始广泛关注农场生产技术定期更新以及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促进农业产值大幅提升。新加坡政府还致力于开发人类未来食品，资助农业科技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替代蛋白质的研发，以期弥补其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缺陷，如人造肉类和海鲜等新型食物，因此，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亚洲的食品科技之都。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通过优先发展现代化农业科技来提升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产值、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确保“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目标得以实现。2019年，根据粮食安全指数中的食物可负担性、可得性和质量与安全等指标为评价标准，新加坡总体粮食安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新加坡政府正加速落实“30·30愿景”，以期到2030年，国内自产农产品可以满足国民30%的营养需求。

为配合现代化都市农业战略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还在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宣布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方面，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为加速实现“30·30愿景”，新加坡政府设立3000万新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的“30·30快捷”津贴补助金，用以专门提高本地鸡蛋、蔬菜、鱼和肉的产量。此外，新加坡食品局发起“30×30快速”捐款活动，向9个高科技农场捐赠3940万新元（约合2910万美元）的资金，用以创新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强化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构建起从农业生产到食品安全保障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专业培训体系，打造出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数量相匹配的专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引导其他行业人员向农业领域回流，新加坡政府对拟转向从事农业的人员进行培训，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实施“新转业”计划。预计在两年内帮助约100名其他领域的员工转向农业相关领域，并着力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预计到2030年，在农业和水产技术食品领域将增设4700个工作岗位，其中约70%为高级技术从业者和管理者。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加大对从事农业基层一线人员奖励激励力度，且为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学习者提供相应津贴。例如，政府为农业科技课程相关学习者提供70%的学费补助，为在职学习者提供70%的工资补助。

以多层次常态化教育引导为保障，强化国民粮食安全意识。由于岛国特殊国情，新加坡在很早就有粮食安全方面的生存危机，并通过多元方式、多种渠道教育引导国民强化粮食安全意识。一是从强化优先意识来看，新加坡政府支持优先销售本土农产品。例如，2020年，新加坡鼓励本土自产农产品使用“SG

新加坡如何确保粮食安全

□ 王 亚

“新鲜农产品”标识。为了让消费大众方便识别和购买国内自产农产品，新加坡食品局还与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商会组织等通力合作，以社区、网络在线组织和农贸市场为单位进行推广。2022年2月，已有超过70多家农场、销售商等申请使用该标签。此外，2020年，新加坡食品局还发起了“新加坡食品故事”活动，动员支持民众优先购买当地食品。二是从强化节约意识来看，新加坡法律明确规定节约粮食是新加坡公民法定义务，如若在餐馆浪费食物需加倍付费；教育部门把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必修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食品安全和消费观，从消费端间接地减小了新加坡粮食安全的压力。三是从强化安全意识的氛围营造层面来看，新加坡政府借助网络媒体实时性、有效性、便利性以及辐射范围广等特征，在全社会开展粮食安全公益宣传，在城市和农村普及营养基本知识，宣传节约粮食倡议，倡导大众科学理性购物。2014年，新加坡政府实施“食品安全健康计划”，提倡食品生产者规范使用化学添加剂，引导居民消费健康食品，优化居民饮食结构，提高全民科学、合理膳食的水平。仅一年多时间，健康食品的选择数量就翻了一番。



(上接1版)

选贤任能重在德才兼备。德才之间，以德为本。《管子·立政》说：“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都是在强调选人用人中德的重要性。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提出：“惟才德兼者贤士也。”“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选人很重要，用人也很重要。唐太宗“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观点，一直为世人称道。不仅如此，对人才还要详细考察，仔细分类，量才使用，人尽其才，这也是选贤与能的重要内容。儒家和法家还有非常丰富的舆论评价、实际考察、先试后用等宝贵的辨人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学习。

治国理政，人才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对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观点，不断探索认识把握选人用人客观规律，提炼总结创新选人用人方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

大同思想是自先秦时代孕育的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观，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中国古人对外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更是集中阐释了“小康”与“大同”理想社会。天下大公，世界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古圣先贤们治国理政

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目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预示着天下大道、大同世界为天下所有人共享。《尚书·周官》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吕氏春秋·贵公》对“天下为公”的思想观念阐释得更为透彻，如“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儒家从“仁道”出发，憧憬“天下为公”，强调“立君为民”“立君为公”，包含着超越时代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

如何实现天下大同，儒家的答案是“和而不同”。“和”，即万物“各得其所”，表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就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达到“太和”“中和”的境界，自然、社会、人事就都和谐共处了。“和而不同”回答了世界及人类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问题，是世界观、方法论，

引领中国文化各个侧面、各个维度的多层次发展，引领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科学把握，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外传统友谊交好和现代和平外交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夯实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坚实的历史共识根基和稳固的历史政策根基。

“彰善癉恶，足为将来之戒”的历史思维

强调以史为鉴，重视史学的镜鉴功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皆有深刻论述。《文心雕龙·史传》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查成空寂，

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更是将史学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深刻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过去，更是通过“述往事”而“思来者”，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来”的思想，比如《易·系辞下》就有“彰往而察来”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就认识到历史中蕴含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深刻道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自镜”，作为现实与未来的镜鉴。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目的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史为鉴不仅是中国古代学家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珍贵遗产。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共观经史”，论述古代帝王的为政得失，更是提出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彰善癉恶，足为将来之

戒”的千古名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这一传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以史为鉴的新论断。比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等等，都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思考。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